

# 回首來時路，想念起梅先生

## Looking Back on My Journey, I Remember Professor Tsu-Lin Mei Fondlly

林英津 (Lin Ying-chin) \*

2023 年 10 月 18 日凌晨，瑞文轉來梅太太的電郵：

2023, 10/14 上午 9 點，祖麟心跳停止，到了醫院就故去了。前後不到兩小時，醫生說他一直沒有醒過來，所以沒有痛苦，他走得安詳。

曾經，梅先生領路，……。這幾年來，我逐漸專注西夏語文獻的解讀、句法分析；雖然勉強維持三、五年總有關於漢語的小論文產出、並參加研討會。梅先生尋常的討論，已經漸漸轉移，移到瑞文長年就閩語建構的語言圖像。……

2017 年 7 月我請休假去 Ithaca，梅先生已然遷入康乃爾大學的退休教授公寓。從住處，我跑過去探望；梅先生梅太太一如過去，歡迎我。梅太太安排我到公寓的泳池；高齡 86 的梅先生在我下水時，篤定的守望在池邊。……

1986 年，中央研究院在南港召開了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（12 月 29 日至 31 日）。時梅祖麟先生在會上宣講〈上古漢語 \*s- 前綴的構詞功用〉。<sup>1</sup> 我剛從臺大畢業年

餘，才以「青輔會博士後研究」的名義進入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未滿一年。那時候的「漢學會議」是高端會



當年初見面，梅先生說，我們家是明成祖駙馬爺的後代——三十多年之後，印象依然深刻。

\* 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。

1 這個油印本中文稿，後來正式收在 1989 年《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·語言文字組上冊》，頁 23-32。（但這篇論文不見於 2000 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《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·梅祖麟先生論著目錄》）。此外《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》同時收錄了一篇相當長的英文稿：Tsu-Lin Mei “The Causative and Denominative Functions of the \*s- Prefix in Old Chinese”（頁 33-52。另見〈梅祖麟先生論著目錄〉：547，發表年份記為 1989b）。兩篇文稿都見在 2015 年洪波等編《梅祖麟教授八秩壽慶學術論文集·梅祖麟先生著作目錄（截至 2011）》：544，發表年份記為 1989c, 1989b。

議，年輕學生還無緣參與。因為是史語所新進的閒人，我給漢學會議坐檯子，才有機會見到書寫〈中古漢語的聲調與上聲的起源〉及〈說上聲〉<sup>2</sup>的論述主，人如其文的梅先生。<sup>3</sup>

漢學會議之後，梅先生在史語所短暫停留，召集語言組的年輕人座談。梅先生一時點名了我，對我寫「吳語連讀變調」的論文提出剴切的批評、提示了一些再思的地方。<sup>4</sup>多年後，我問梅先生為什麼特別眷顧我。才知道，完全是自己水仙花式的一廂情願。但是，這個一廂情願的誤會，卻是我轉變研究取向與路徑的契機。

在研究院重頭起，我需要學習完全陌生的西夏文

字，需要閱讀西夏語翻譯的《孫子兵法》。<sup>5</sup>拿左手，我記音臺灣海陸客語，結合早期傳教士留下來的客語語料、<sup>6</sup>與董同龢先生1948年的〈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〉語料。<sup>7</sup>1989年我才能嘗試書寫“*Aspects de ‘ㄘpun’ 別 et ‘ㄘlau’ 搵 ( / ‘ㄘthung’ 同) dan les Dialectes HAKKA*”，提交巴黎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（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, EHESS）的「第五屆國際東亞語言暨語言學研討會」（1989/06/14-15）宣讀。<sup>8</sup>

1989年12月，梅先生到新竹清華大學客座，<sup>9</sup>趁便再次到訪史語所，開啟了三次與龔煌城先生對談漢語上古音。

- 2 最初，我讀的是中文翻譯：黃宣範翻譯，〈中古漢語的聲調與上聲的起源〉，收在《幼獅月刊》40.6（1974）：69-76。原文為“*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*,”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, 30(1970): 86-110。若〈說上聲〉一文，則刊在《清華學報》新 14.1-2（1982）：233-241。
- 3 第一印象，梅先生有一張中國式的 face，言談舉止十足洋式。當時，在漢學會議上真正吸引我的，其實是日本的橋本萬太郎。橋本的論文是 *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oochow Tone Sandhi*（收在1989《論文集》：379-394）。因為，1983年我曾經在丁邦新老師的課上寫了一個讀書報告——老派上海方言連讀變調的分析；漢學會議那一年10月我修訂舊稿，成〈老派上海方言兩字組的連讀變調〉一文，作為史語所語言組的講論稿。「連讀變調」的現象，就是橋本的 Tone Sandhi。那時候，我還不知道梅先生1977年也有一篇討論 Tone Sandhi 的論文：“*Tones and Tone Sandhi in 16<sup>th</sup> Century Mamdarin*,”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, 5: 237-260。
- 4 後來，我在第五屆聲韻學研討會（1987）上宣讀了再改寫過的〈論吳方言的連讀變調——以老派上海話為分析實例〉，最後該文收入《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》16: 223-254。那是我寫當代漢語方言聲調唯一的論文。之後，我不再倚賴二手資料、再不作平面跟風式的論述。
- 5 當年，我打破頭，一心只想進入史語所。所方開出來的條件之一，是我必須學會西夏文。而我不知有金庸的《倚天屠龍記》，不識西夏國書。不知不識；橫豎就是一種語言，誰怕誰，我想。以古漢語寫成的《孫子兵法》，選用得著怕嗎？好歹我認得漢字。
- 6 *Dictionnaire Chinois-Français, Dialect HAC-KA*，由法國籍傳教士雷卻利（Rey, Charles）於1926年出版，主要記錄廣東汕頭客語。辭典所收字詞豐富，有許多教會用語、諺語及成語詞條，是研究早期客語相當珍貴的資料。雷卻利1937年又以法語翻譯、編寫了一本客語會話集《客家社會生活對話》（*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 avec Notes Grammaticales: Langage HAC-KA*）。這兩部語料與1989年的臺灣客語之間，兼有歷時縱深、與地理分布的歧異。
- 7 （1）梅先生嘗說：他雖然沒有上過董先生一堂課，一直把自己當作董先生的學生。在哈佛和董先生的接觸，影響了他的一生，使他走向漢語語言學的路。後來，在臺灣大學講「我的學思歷程」，梅先生又一次公開宣說「這兩年間跟董先生的接觸影響了我一生，在六十年代使我走向漢語語言學的路。」（<https://host.cc.ntu.edu.tw/sec/schinfo/epaper/article.asp?num=639&sn=2460>《台大校訊》第639期）。
- （2）董先生這篇論文，收在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19：81-201。後來又收入丁邦新編，《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》（臺北：食貨出版社，1974），頁153-274。
- 8 （1）那是人生第一次放洋。為了到巴黎開會宣讀論文，初稿在瑞士籍神父的協助下勉強以新學的法文書寫。本意照本宣科；孰料全場與會者都能說漢語，有的人捲舌音比我還溜。後來的修訂稿遂改為漢語書寫；1990年修訂中文全文〈論客語方言之“ㄘpun”別與“ㄘlau”搵（/“ㄘthung”同）〉，收入 *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(C.L.A.O.《東亞語言學報》)* 19.1: 677-716。
- （2）梅先生在臺灣鼓吹研究閩南語，我選擇客語，而且是海陸客語；梅先生不置可否。閩南語雖然是我的母語，小學以來卻只知道說國語；高中畢業以後才幡然醒悟，重頭學說閩南語。因此，我讀楊秀芳的論文，很多語料都聞所未聞。既然都要仰賴別人發音，何不乾脆找個陌生的語言。並且，那時也有老師說，客家話跟國語沒有什麼差別；頗有怪我不務正業的樣子。我想，純屬推理，不能輕易認同客語跟國語很像；我相信除了語音之外，客語應該自有其語法特色。……。
- 9 梅先生的父親梅貽寶先生，1922年畢業自北平清華學校（後來的清華大學）。伯父梅貽琦先生，曾經執教清華學校，1931年起擔

第一次對談：12月9日對談主題是，比較李方桂先生與雅洪托夫（楊托夫，Сергей Евгеньевич Яхонтов）的上古音系統。梅先生指出，雅洪托夫1960年代對漢語的若干論述，影響我們這一代對上古音的研究。<sup>10</sup>以後李方桂先生發表了他的《上古音研究》（1971），給上古音做出系統的構擬。但是，同時研究上古音的學者都沒有完全接受；尤其是李先生給幽部（\*-ag<sup>w</sup>）跟宵部（\*-ag<sup>w</sup>）構擬的唇化舌根音韻尾（labial-Velar finals）。龔先生則從同源詞講起一同源詞的系統建立在有規則的對應，代表語言產生的時代。根據同源詞的證據，同部

位陰陽入對轉的現象，龔先生推崇李先生的四元音系統。<sup>11</sup>

第二次對談：12月23日延續第一次對談話題之「漢語的鐵 \*thik，<sup>12</sup>泰語什麼時候借過去的？」梅先生從漢語的角度提問，「為什麼漢語的鼻音聲母（次濁聲母）借到泰語變成清鼻音（聲調相當於泰語的1調）？」龔先生從泰語下手，指出「在泰語語音史中，清濁聲母有不同的演變。現在的某些調是古代的清聲母變來的，濁聲母字以這種調借入，會被誤認為清聲母來源。」<sup>13</sup>

第三次對談：時間已經翻過一年。1990年1月13

任清華大學的校長。1955年在臺灣新竹市赤土崎將清華大學在臺灣復校，並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。1958年7月任教育部部長，兼清華大學校長。1962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4屆（數理科學組）院士。1963年梅貽琦葬於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梅園，清華師生尊稱他為「永遠的校長」（不妨參看梅先生寫的「紀念五伯伯梅貽琦校長」[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10629012840/https://www.sohu.com/a/467414546\\_228930](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10629012840/https://www.sohu.com/a/467414546_228930)）。

10 梅先生舉出雅洪托夫的論文，如下：1960年〈上古漢語的複輔音聲母（Consonant Clusters in Old Chinese）[Сочетания согласных в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]〉及〈上古漢語的唇化元音（The Rounded Vowels of Old Chinese）[Фонетик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I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до н.э. (лабиализованные гласные).]〉。〈上古漢語的唇化元音〉一文，1970年由羅杰瑞（Jerry Norman）英譯“The phonology of Chines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(rounded vowels),” Unicorn (《麒麟》) 6: 52-75。學生時代，我的兩個學位論文都是研究中古漢語韻書的音韻結構。但是，我完全不知道有雅洪托夫。

11 (1) 梅先生建議聽講的我們，像他一樣，除了閱讀 Hwang-cherng Gong, “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, Tibetan,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 (漢藏緬三種語言元音的對比),” BIHP 51.3(1980): 455-490。還應該讀龔先生的博士論文：Hwang-cherng Gong, *Die Rekonstruktion des altchinesischen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von Wortverwandtschaften*, 1976. (《從同源詞的研究看上古漢語音韻的構擬》). Inaugural-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Doktorgrades der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der Ludwig-Maximilians-Universität zu München。

(2) 十五年後（2004年6月30日）何大安又安排梅先生與龔先生對談漢藏語比較研究，時梅先生回憶這次的對談，他說：「第一場我們談的是上古漢語元音系統中兩種不同的主張，一個是李方桂先生四個元音的系統，另一個是雅洪托夫、Baxter（白一平）六個元音的系統。那個時候，我比較支持六個元音的系統，龔先生則是四個元音的系統。……我們並不是隨便、而是非常有系統地談漢藏比較的問題。」語見〈漢藏語比較語言學的回顧與前瞻〉,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7.1(2006): 225-258。這是由吳瑞文執筆之2004年6月30日的龔梅對談記錄，後來又收入2011年《語言暨語言學》專書系列47《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》: 313-348。

12 第一次對談，龔先生說：「『鐵』字在中古音是 \*thiet，可是這個字聲符是『王』 \*thing，是 \*-ng 收尾。因為是諧聲字，所以原來韻尾的發音部位可能是一樣的，一個收 -k，一個收 -ng，是陽入對轉。『鐵』字古音如果是 \*thik，假定發生 \*thik > \*thit > thiet 的變化，只有一個證據，就是它跟『王』這個字諧聲。可是泰語『鐵』叫做 hlek。如果漢語的『鐵』跟泰語的『鐵』有關係，而且如果 \*thik 這個擬音正確的話，我們現在可以看看發生了什麼變化：首先，\*k 在高元音後面面向前移，變成 \*t。以後 \*-i- 發生分裂，就變成 \*-ie-，變成四等韻。這個現象就跟『短』的現象平行。『短』原來是 \*tung，在高元音 u 後面，\*-ng 向前移，就變成 \*-n。以後 \*-u- 也發生分裂，變成 \*-ua-。-i- 分裂，不是變成 -ia-，而是變成 -ie-，就是現在的四等韻。耕部、支（佳）部，沒有一等，只有四等韻。……像『鐵』要有諧聲字，來暗示它來源於 \*k；還要有泰語的 -k 來對應。『鐵』的變化，跟『短』互相配合，這些整合起來構成一個上古音系統。……」

梅先生隨即說：「跟這個平行的，是『節』 \*-ik > \*it，它的諧聲是 \*k 尾。假如龔先生說『鐵』這個字是平行的話，是戰國以後的事。上古音還是 \*-ik，不是 \*-it 『鐵』是很晚起的東西，戰國才有鐵。因為東西晚進來，所以可以證明 \*-ik > \*-it 的時間很晚。……我們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來，泰語借字其實是漢朝借的比較多。鐵這個東西。在中國也是戰國時才有的。」

13 (1) 在這次對談裡，起點是李方桂。1977.《比較台語手冊（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）》。對談時，提點到的語言則包括剝隘、龍州土語。這些都是李先生開發的研究領域，讀者不妨讀一讀2011出版的中文本《李方桂全集·侗台語論文集》。若泰語（Phasa Thai < Proto-Tai）在語言系譜分類上，一般說屬於侗台語系的語言；外來他稱為暹羅話（Siamese）。當時，梅先生與龔先生都同意，

日梅先生談及他 1984 年夏天寫的長文〈上古漢語 \*s- 前綴和 \*-r- 中綴的構詞功用〉；<sup>14</sup> 當時他想利用最新上古音的發展，說明漢語有 \*-r- 中綴。<sup>15</sup> 梅先生想向龔先生討教，能不能把漢語的 \*-r- 中綴連接上藏文的 r- 前綴。龔先生並未正面回應梅先生的問題，只是簡短的補充說明梅先生提問的背景。指出，梅先生結合最新聲韻學和傳統訓詁學的研究，討論漢語 \*-r- 的問題；進一步要跟藏文的 rC 連起來考慮，是深入的研究構詞成分的功能問題。龔先生鼓勵在場的研究生，以梅先生的研究為基礎接下去研究，看看將來是不是能夠有所突破。<sup>16</sup>

經歷三次對談的洗禮，我才初步體認古漢語既深邃又開闊的天地。想要成就古漢語的研究，我的漢語儲備智識還太淺，也缺乏發現問題、深入研究的意識。雖然已經「得個屁也吃得 (Ph.D.)」了，是不是學者還不得而知。

另一方面，我充分感知到，行事洋派的梅先生，懷抱著溫潤如玉的學術之心。在年輕學生的面前，梅先生發想、提問率直，論述誠懇坦然。<sup>17</sup> 他極力推崇龔先生

以具體的語料賦予「對轉」合理性的論述。<sup>18</sup> 再如，學術史上，自從雅洪托夫 1963 年給與來母字諧聲的二等字擬測為帶 -l- 的複聲母，李方桂先生《上古音研究》將 -l- 修改為 -r-；龔先生則根據漢語于母字，無一例外，對應藏文 gro，確定上古喻三聲母（于母）應該擬測為 \*gwrj- > j-。<sup>19</sup> 梅先生在「對談」中轉而講述，是這麼說的：

……最初是二等字有 \*-r- 介音；後來從圓唇元音跟不圓唇元音的考慮，結果就出來帶 \*-r- 的唇化舌根音 (labialized velar)；再下一步就出了 \*gwrj-，就跟藏文的 gro-，對得非常準。

梅先生的講述，曾經讓我心生疑惑。而今回顧三次對談的紀錄，對我而言，過去的疑惑不再。只是，終究遺憾，我未能跟進梅先生的學問。……

同一年，我開始著手申請傅爾布萊特 (Fulbright) 學術交流基金會的獎助學金，準備在 1991 年下半年起向史語所申請留職留薪，赴美進修一年；預期掛單康乃爾大

漢語與泰語不是同源的語言。雖然，人類學家與語言學者在某些細節還有不同的意見。

(2) 參看注 11- (2)。2004 年梅先生嘗說 (語見〈漢藏語比較語言學的回顧與前瞻〉)：「(第二場) 我們進入漢語跟泰語是否有親屬關係的討論。我記得，那時候龔先生捧了書，還預先寫好了講義，非常有系統、細密地論證，要說明漢語跟泰語有親屬關係，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。在那個時候，漢語跟藏緬語的比較研究，元音的對應關係已經相當明確，漢語複輔音的擬構也大體成系統了。如果用同樣的標準，什麼時候可以有證據說明漢語跟泰語是不是有親屬關係？好像還是非常遙遠的路。……，他 (龔先生) 說他研究漢語與傣語是否有親屬關係；研究之後，發現找不到可靠的同源詞。……」

梅先生後續還說：「雖然漢語跟傣語是否有親屬關係，現在我們沒有共識。我覺得也許、大概、可能值得再繼續研究研究，並不是恰到好處說法。」

14 參看注 1。長文有一部分內容，後來應該就是 1986 年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時梅先生發表的〈上古漢語 \*s- 前綴的構詞功用〉及“The Causative and Denominative Functions of the \*s- Prefix in Old Chinese”。

15 梅先生的原話：「現在看漢語的 \*-r- 中綴，好像只是從音韻的觀點來看，構詞的功用並不很清楚。但是既然 \*-r- 能夠把名詞變成動詞，又能夠把動詞變成名詞；……」

16 三次對談的內容，由徐芳敏與我轉寫現場的口語錄音，再請兩位先生校讀補充成文。後來，以〈上古音對談錄〉之名作為「第一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」會議論文集的附錄，刊在《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·第一輯·漢語方言》(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2)，頁 665-719。後來，梅先生將這個對談記錄收入他的《漢藏比較暨歷史方言論集》，頁 1-52。

17 例如，梅先生對「1989 龔梅對談」回顧、自評，居然說「有龔先生非常仔細的論述，我主要是幫腔。」(語見 2004 年 6 月 30 日龔梅對談的文字記錄)。

18 參看注 12。如「短 \*tung > tuan」从「豆 \*dug」得聲，是元部與侯部對轉。梅先生說跟這個平行的是「節」。我且虛擬：「節 \*tsik > (\*tsit) > tsiet」从「即 \*tsjk」得聲，似乎是脂部與之部的關係。龔先生的「鐵 \*thik > \*thit > thiet」從「王 \*thing」得聲——應指與「王」字形相近，而《廣韻》上聲迴韻班小韻下收一釋「善」从「土」之字——是脂部與耕部的關係。

19 請看李方桂 1971：9-21，並比較龔煌城 1990 之〈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〉。龔先生 1990 年原刊於《西藏研究論文集》3：1-18，1994 重刊於《聲韻論叢》1：73-96；後來收入 2002 龔煌城《漢藏語研究論文集》：31-47。

學東亞學系 (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)，央請梅先生擔任我的 Sponsor。梅先生即刻答應，並為我取得康大東亞學系的邀請函，使我順利獲得基金會的獎助金。

終於實現遊學美國的願望了，我沒有考慮到，中學沒有好好學英語、中文系混了 11 年，我完全沒有口說英語的能力。梅先生卻替我想到了，報到當天就讓他的助手安排我進修英語。<sup>20</sup> 並且要我去旁聽 John R. McRae 講授的禪宗佛學課程，直接讓英語轟炸。現在想來，不僅是接受英語轟炸；那時候的梅先生比我更清楚，研究西夏語必須有一定的佛學知識。而那時的，對佛學根本連皮毛的知識都沒有；最初聽講幾乎是鴨子聽雷，完全跟不上。McRae 教授的研究主要是漢傳禪宗，他講授的內容實無關西夏語、西夏文獻。多年之後，2009 年 12 月 17-22 日我與索羅寧 (Solonin Kirill J.) 在臺灣合辦「西夏語文與華北宗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倒是請到 McRae 來發表論文。他不認得我了；拜梅先生之賜，我還是清晰的記憶，McRae 在我心裡留下的一些東西。<sup>21</sup>

除了英語，梅先生每週總有兩、三個鐘頭，或者在他家裡，或者在他的辦公室裡，找我討論古漢語、漢語

方言；青年李亞非 (Yafei Li) 也來辦公室。<sup>22</sup> 這樣的強迫學習，直接催生出，翌年我參與密西根大學的「北美漢語語言學研討會 (NACLL-4, 1992, 05)」。<sup>23</sup>……

當然，屬於康大的記憶，並不是只有語言學。例如，黃家小姐教會梅太太游泳，<sup>24</sup> 梅太太、小姐姐都成了我的泳伴；她倆的泳姿精確優美，我卻自由式不像自由式、蛙式不懂夾水、單靠仰式浮沈。卅多年過去了，我還是只有仰躺在水面上，才能自在。

通常，我從寄宿的雜貨店徒步上坡、上學。黃昏往往穿過校園，去到梅先生家裡。第一次見到老太爺，第一次聽見梅先生溫柔呼喚，「噯，媽啊！林英津來了，……。」梅太太白天在 Olin 圖書館上班，工作並不輕鬆；總是開心留我吃晚飯。飯後，梅先生還讓開車送我回。逢週末，有時梅太太也會開車來雜貨店，帶我去 mall 採買民生日用。

倘若回溯記憶，以「梅祖麟」為關鍵字，我對梅先生 1969 年〈文法與詩中的模稜〉，《史語所集刊》第 39 本上冊：83-124，及〈從詩律和語法來看〈焦仲卿妻〉的寫作年代〉，《史語所集刊》53:2 (1982)：227-249，

20 (1) 那個時候，基金會幾乎沒有英語能力的要求，我僥倖蒙混過去；雖然，行前我先去科見美語補習了半年。至於到康大之後的進修英語，並不是讓我去讀語言學校；而是康大校內專門為留學生設計的，付費美語訓練課程。現在想來，那樣的訓練課程，立意良好；實際上成效有限。因為，在那個環境裡，固然可以結交小朋友；唯是，大家的英語都一樣破破的，並不是好的學習環境。除了老師之外，能向誰學習？

(2) 有幸，我結識了一位本地學生，是位溫柔又有耐心的姑娘。這位姑娘，在我去密西根大學參會宣讀論文 (NACCL-4, 1992, 05) 前，幫我修改英文稿，並陪著我一句句唸英文稿。破題兒第一遭，當眾開口說英語，我才能勉強蒙混過關。……我終未能改善口說英語。2015 年在劍橋大學閉門討論西夏語文獻。會上諸公不等我說完第一句話，就舉手抗議；以很標準的漢語，要我直接說中文。

21 起先 McRae 給的標題是 Kharakhoto Texts and Early Chán Buddhism (黑水城文獻與早期禪宗)；實際上宣講的則是 Locating the State of White and High in East Asian Macro-history (宏觀東亞歷史中西夏的定位)。他說：「第二個千年，世界歷史的變化顯示，宗教信仰從根本上變得更加世俗。……然而，強力支持佛教，是西夏和其他中原周邊國家的共同特徵。……。」未料，會後不到兩年，McRae 就故去了 (<https://cbeta.org/node/99>)。

22 李亞非 (Yafei-Li)，現在應該還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研究中心 (Institute for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,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, University of Wisconsin-Madison)。

23 (1) 參看注 20- (2)。The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(NACCL-4, 1992, 05)。這是一年一度北美「漢語與語言學研究」的學術會議。當時的論文標題是“The Postverbal Auxiliary ‘tau’ in HAKKA”。論文幾經改寫，連標題都換了。〈客語上聲「到」語法功能探源〉刊在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63:4 (1993)：831-866。

(2) 這樣的回憶起，不由得我心浮起一絲苦澀。現在，不僅記不起姑娘的名氏，當年的文稿似乎也沒有存檔。那時，一起去密西根的顧陽曾經委婉說，她不太看得懂我討論的問題。顧陽，現任教深圳香港中文大學人文社科學院。

24 黃正德老師那時也在康大。黃老師是陀螺，難得見面。黃師母偶然會帶著孩子們來臺灣人的聚會。

印象極其深刻。我能清晰記得，有一回梅先生在史語所，與同事魏培泉論辨《孔雀東南飛》的語言。<sup>25</sup>

學生時代，我不免也感染一點維根斯坦（Wittgenstein）。<sup>26</sup>事實上，早期梅先生的文學評論，例如黃宣範翻譯的〈分析杜甫的「秋興」——試從語言結構入手作文學批評〉，解析杜甫〈秋興八首〉，<sup>27</sup>及在《中外文學》連載的、也是黃宣範翻譯之梅先生與高友工解析唐詩的論文：〈論唐詩的語法，用字與意象〉、<sup>28</sup>〈唐詩的語意研究：隱喻與典故〉，<sup>29</sup>也曾經令我著迷。

那個時代，中文系的「文學評論」相對荒蕪；透過黃宣範的翻譯，梅先生和高友工的論述等同荒漠甘泉。<sup>30</sup>臺大的廖蔚卿老師在「六朝文論」的課上，就建議我從「語言」的觀點看鍾嶸的《詩品》。我曾經默默的從圖書館借出一冊東坡詞，心想，韻書怪無聊的，何不試試解析蘇詞的語言。東施效顰的念頭，當然以敗興終。雖然，我不至於對古典詩詞，如梅先生一般自評「無動於衷」；<sup>31</sup>也不可能有如癡如醉、起而歌舞的熱情。

從不曾和梅先生談文，是我小小的遺憾。我保留了  
不少梅先生以鉛筆手寫、論學的手稿；其中有一份是



2017年7月，在康大退休教授公寓前與梅先生合影。右立者為陳保基先生（臺灣畜牧學家，康乃爾大學動物營養學博士。曾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11任主任委員，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暨研究所教授）；遠處，左方陽台上，梅太太兀自目送。

25 《孔雀東南飛》，原題為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》。魏培泉，〈論用虛詞考訂焦仲卿妻詩寫作年代的若干問題〉，《史語所集刊》62:3（1993）：531-567。

26 真的。當年臺大入學口試，何佑森老師問我，語言學讀過什麼書；我毫不考慮的回說「維根斯坦」。後來也真的翻讀過，陳榮波，《哲學分析的天才：維根斯坦》（臺北：允晨文化公司，1982）；及幼獅出版、劉福增翻譯的《維根斯坦》。現在想起來，還是覺得荒謬極了。「維根斯坦」是當時年輕學生的新潮流，我只不過跟著掛在口上，哪裡懂什麼？！幸虧何老師、張亨老師沒有追問，否則我應該會當場出糗。

27 Tsu-lin Mei & Yu-kung Kao, "Tu Fu's 'Autumn Meditations': 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,"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, Vol. 28(1968): 44-80。1972年由黃宣範翻譯，標題作〈分析杜甫的「秋興」——試從語言結構入手作文學批評〉，《中外文學》1:6: 8-26（譯者註明「本文譯自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語言學期刊 UNICORN（《麒麟》）第一期。原作者梅祖麟及高友工兩先生先現分別任教於哈佛及普林斯頓大學」）。後來，收入《語言學研究論叢》（臺北：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，1974）。

28 Kao Yu-kung & Mei Tsu-lin, "Syntax, Diction, and Imagery in T'ang Poetry,"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, 31(1971): 49-136。黃宣範翻譯 1973年在《中外文學》vol.1.10: 30-63、vol. 1.11: 100-114、vol. 1.12: 152-169之「梅祖麟、高友工原著，〈論唐詩的語法，用字與意象〉（譯自1971年9月出版的「哈佛亞洲研究月刊」(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))」。

29 Yu-Kung Kao & Tsu-Lin Mei, "Meaning, Metaphor, and Allusion in T'ang Poetry,"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, Vol. 38.2(1978): 281-356。黃宣範翻譯 1973年在《中外文學》vol. 4.7: 116-129、vol. 4.8: 66-84、vol. 4.9: 166-190之「梅祖麟、高友工著，〈唐詩的語意研究：隱喻與典故〉」。後來黃宣範 1976年出版了《翻譯與語意之間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），其中頁 133-215 集結為〈唐詩的語意研究〉。

30 透過黃宣範的翻譯，可謂一時轟動。我從東海到臺大，已經是 1980 年了，仍然可以感知這幾篇論文帶起的結構主義批評的熱。

31 2000年12月7日梅先生在臺大思亮館「我的學思歷程」記錄稿（《台大校訊》第639期）。

2008年2月27日同時寫給何大安和我的長信。由於內文頗有學術史的意思，我讓助理黃育正輸入電腦。<sup>32</sup>信裡梅先生提到，2002年7月在臺灣開院士會議，會後我請他跟黃布凡吃午飯，他才知道黃布凡是傑出的治藏緬

語的學者。及讀《漢藏語概論》，又知道戴慶廈的比較藏緬語造詣頗深；<sup>33</sup>梅先生說「戴慶廈是馬學良的學生，猶如我是董同龢的學生」。我趕不上師從董同龢先生；我是梅先生的學生，雖然我不曾上過梅先生的課。



兩千年的時候，梅先生與梅太太在臺灣臺北

32 電子版信文長達 A4 紙七整頁。其中，梅先生還提到上古漢語兩條清化規律：s 清化的 s-br > s-pr > pr、清化鼻音的 s-m > s-m̥ > m̥。

33 馬學良主編，《漢藏語概論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1）。黃布凡老師撰寫書中藏緬語篇的羌語支，我曾在北京從黃老師學習藏文、藏語。黃老師與梅先生同年生，與撰寫藏緬語篇景頗語支、緬語支、彝語支的戴慶廈先生長期任教北京中央民族大學；2021年黃老師先走了。戴先生比梅先生晚兩年生，現在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榮譽資深教授。